

现代性研究译丛

# 现代性的碎片

周宪 许钧 / 主编 [英] 戴维·弗里斯比 / 著  
THE FRAGMENTS OF MODERNITY

商務印書館

**现代性研究译丛**

# 现代性的碎片

——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  
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

[英] 戴维·弗里斯比 著  
卢晖临 周怡 李林艳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 / (英) 弗里斯比著；卢晖临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现代性研究译丛)

ISBN 7-100-03764-6

I . 现… II . ①弗… ②卢… III . ①齐美尔 - 哲学思想 - 思想评论 ②克拉考尔 - 哲学思想 - 思想评论 ③本雅明 - 哲学思想 - 思想评论 IV .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77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现代性研究译丛

现代性的碎片

——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

[英] 戴维·弗里斯比 著

卢晖临 周怡 李林艳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764-6/B · 562

---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5/8

印数 5 000 册

定价：23.00 元

## 现代性研究译丛

### 总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曰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像，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

## 2 现代性的碎片

位法国诗人韩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韩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韧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 80 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期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

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显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到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波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

#### 4 现代性的碎片

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与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 宪 许 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

# 目 录

致谢 .....	1
导言 .....	4
第一章 现代性 .....	16
第二章 乔治·齐美尔:作为永恒现在的现代性 .....	51
第三章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现代性的“范例” .....	142
第四章 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的史前史 .....	252
结论 .....	353
注释 .....	362
参考书目 .....	412
索引 .....	424
译后记 .....	427

## 致 谢

我要感谢为我提供本书资料的下列图书馆的全体职员：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英国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海德堡大学图书馆、康斯坦茨大学图书馆和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特别要感谢的是德语文献档案馆(马尔巴赫/内卡河畔)的工作人员，在他们的指引下我查阅了克拉考尔的遗稿，使我收益良多。在这方面，我也非常感激因卡·米尔德，她慷慨允我参考了她当时还未发表的关于克拉考尔的论文“经验式的思维”。

洪堡基金会为我提供了在海德堡大学(1980—1981)和康斯坦茨大学(1982/1983/1984)的研究资助，没有它的慷慨资助，这一研究是无法完成的。同时，在此我还想感谢沃尔夫冈·施卢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 海德堡大学)和霍斯特·拜尔(Horst Baier, 康斯坦茨大学)对我的热情接待和协助。同样，我要对那些在1981年(在海德堡大学)和1982年(在康斯坦茨大学)出席我主持的“关于现代性的社会理论”暑期研讨会的同学表示感谢。在牛津巴列奥尔学院的那个学期，作为斯内尔访问学者，我进一步提炼了这一研究的提纲，我一样要感谢学院院长和董事的盛情。

这一研究的若干部分曾以论文的形式提交给近期召开的学术会议。特别要提及的有，由沃尔夫冈·舒勒(Wolfgang Schuller)在康

## 2 现代性的碎片

斯坦茨大学主办的“现代性与古代性”研讨会,以及由奥滕·拉姆斯特德(Otthein Rammstedt)和尤根·达梅(H. Jurgen Dahme)在比勒费尔德大学组织的两次会议,一次是关于齐美尔(1982),一次是关于社会学在德国的奠基(1984)。尤其是后一次会议,与会者的讨论让我受益匪浅。另有一篇论本雅明的现代性的史前史的论文曾经在法兰克福学院(1984)的一次会议上宣读过,这次会议由洪堡基金会主办。

最后,我要感谢布鲁·拉森(Pru Larsen)打印了原稿,并且,一如既往地,为格式编排提供了宝贵建议。

戴维·弗里斯比  
1985年于格拉斯哥

作者和出版社对下述版权所有者准许在本书中引用曾经发表过的资料表示感谢:

哈科特·布雷斯·约万诺维奇公司(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关于本雅明的《查尔斯·波德莱尔》和《单行街》的摘录。

卢德里奇公司(Routledge)和基根·保罗(Kegan Paul)。关于齐美尔:《货币哲学》的摘录。

西蒙和舒斯特公司(Simon and Schuster Inc.)。关于伯曼的《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的摘录。

祖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关于本雅明作品的摘录,其中包括《摘要》之二。

西格弗里德·翁泽尔德(Siegfried Unseld)博士和祖尔坎普出版社。关于克拉考尔作品的摘录。

沃索出版社(Verso and New Left Books)。关于本雅明的《查尔斯·波德莱尔》和《单行街》及伯曼的《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的摘录。

## 导　　言

顺其自然……生活川流不息，无所阻遏；它的永不休止的韵律对抗着任何特定形式的固有聚留物。每一种文化形式，一旦被创造，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遭受生活的诸多力量的吞噬。只要一种文化形式得以充分发展，下一种形式就渐次萌芽；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竞争之后，新的必然会取代旧的。

格奥尔格·齐美尔

……仿佛现在会持续到永远。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在破坏型人物眼中，没有什么恒常之物。但恰恰因为如此，他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现道路。在别人因墙壁或山脉而阻隔的地方，他却看到了一条道路。但是，因为他处处都看到路，他也就不得不处处清除这条道路上的障碍。（这种清除工作）并不总是仰仗蛮力，有时借助的是最精巧优雅的力量。正因为他在哪里都能发现道路，他总是使自己置身于十字路口。这一刻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他将存在的事物化为瓦砾，并不总是为了瓦砾本身，而是为了那条穿过瓦砾的道路。

瓦尔特·本雅明

本项研究主要讨论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 1889—1966)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这三位学者的现代性研究方法。它不仅旨在介绍他们对现代性所做的实质分析，而且要讨论在任何现代性研究中都会出现的方法论问题。因此，他们对现代性所做的不同分析——暂且将其视为体验“现代”社会“新奇”之处的种种方式——就与形形色色的方法论预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现代性分析的共同点，是经常无意识地接受现代性现代概念创始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所刻画的特征，即“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

现代性本身这一主题再一次成为社会理论的讨论中心；而且，伴随着假定的后现代性及后现代运动的到来，它也成为文学和美学领域讨论的话题。这一点明显地反映在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介入现代性理论所引发的论辩中，也反映在围绕伯曼(Marshall Berman)对现代性以及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对后现代性的批判性研究所引发的论辩中，更不用说卢卡奇(Georg Lukacs)等人在美学领域对现代主义早期批判的持续不断的论辩，那些批判本身就是以一个现代性理论为前提。

其实，当代这样的讨论或争论并不新鲜。一个多世纪以前，波德莱尔、马克思和尼采就曾以不同的方式，试图去研究并采用批判的态度对待“现代”社会中的“新奇”之处及其文化表现形式。此外，如果我们忽视社会学勾画现代社会业已产生的体验社会领域新模式的尝试，就很难理解它何以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也难以理解这一学科地位确立过程在当

## 6 现代性的碎片

时引起的争论和今天仍然激发的争论。

不幸的是,近来对社会学理论“经典”中现代性主题的重新发现,过分突出了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在很多方面看都是最坚定的反现代主义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虽然,韦伯的反现代主义立场并没有妨碍他提出一个专注于理性化过程及其对个人之后果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尤其是,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随之而来的意义的丧失及失控——但他的现代性研究,没有能够对资本主义所开启的体验中的重要变迁给予适当地处理。将注意力集中于韦伯作品中的现代性主题,意味着该主题的重要性在那些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诸如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和齐美尔的作品中,只是刚刚起步。

本项现代性研究,特意处理的是从一个与众不同的焦点开始其研究的三位学者的作品。最先考察的是齐美尔提出的现代性社会理论,若以波德莱尔最初界定的现代性含义来衡量,齐美尔也许是第一位研究现代性的社会学家。他的《货币哲学》(1900)<sup>1</sup>一书已经详尽阐发了其现代性理论的纲要,比韦伯开始他的现代性的思考要早好几年。

就克拉考尔而言——齐美尔最早为他打开了“通往现实之门”——他的早期作品对现代性的分析,似乎处理了一个直接来自于韦伯的主题,即工具理性的支配和理性化过程的后果。然而,进一步的考察表明,克拉考尔对有限知识理性形式的讨论,可以同样容易地通过仔细阅读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克拉考尔曾广泛地论述过齐美尔),以及通过阐发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当然,在这

本书中,韦伯的中介影响也不应被低估)的某些中心议题,就能找到源头。此外,克拉考尔早期的准存在主义立场为克尔恺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作品提供了证明,后者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曾风行一时。最后,在实质性层次上,克拉考尔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就关心德国理性化的资本主义过程。这一理性化过程在1924年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的刺激下开始起步,并在随后的魏玛年代因不断加深的资本主义危机而加速。考虑到克拉考尔日趋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取向,即使不从韦伯观点中找寻依据,他也可以不费劲地将理性化视作本质上的非理性化过程。

本雅明试图构造一种现代性社会理论,这种努力在《单行街》(1928)<sup>2</sup>一书中已经含蓄地表达出来,并进一步贯穿在后来以“拱廊街计划”而闻名的研究中。尽管本雅明的早期著作显示出常常让人迷惑的渊源联系,并发展出了重要的社会学面向,但他的上述努力根本不能归功于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实际上,在他“拱廊街计划”的注释中,频繁引述的只有一个社会学家:齐美尔。“拱廊街计划”最初的灵感,来自于阿拉贡(Louis Aragon)《巴黎的农民》中“歌剧院通道”的超现实主义意象。随后,本雅明的现代性理论,将在现代性史前史中找到起源,其中一个主要着落点是19世纪早期巴黎人的拱廊街。这些拱廊街,将被人们视作通向表达资本主义梦境的那些想象、错觉和幻景的原始世界的入口。

假如事实确实如此,即研究现代性社会向度的三种努力较少归功于韦伯的现代性分析——如果将后者理解作是去勾勒现代西方社会区别于早期社会形态以及其他文明的特点的话——那么,它们探讨的现代性是什么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齐美尔、克拉考

## 8 现代性的碎片

尔和本雅明都关注人们感受和体验资本主义剧变所产生的社会和历史存在的新的方式。他们的中心关怀是表现为过渡、飞逝和任意的时间、空间和因果性这三者的不连续的体验——这种体验存在于社会关系的直接性中,包括我们与都市的社会和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过去的关系。

这种分裂、混乱和迷茫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在文学和艺术运动中,到19世纪晚期,这些运动甚至被冠以“现代派传统”、“现代运动”和“现代主义”等名称。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著作有一共同的特征——至少在有关现代性社会面向的探讨中——他们都表现了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现代主义的浓厚美学兴趣,而这又反过来影响和丰富了他们有关现代性的想象。

齐美尔经常描写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和艺术运动——描写自然主义和较为间接的“新艺术”(青春风格)运动——以及艺术和文学方面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艺术方面的阿诺德·伯克林(Arnold Böcklin)和罗丹(August Rodin),文学方面的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和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他还与厄恩斯特(Paul Ernst)和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等作家通信。更为重要的是,在齐美尔自己的表述风格和方式中,并不难看到诸如印象主义这样的美学运动的影子。至于克拉考尔,他匿名发表于魏玛时期的小说《金斯特》(Ginster),本身就被誉为一部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品。他为《法兰克福报》和其他杂志撰写一系列文章,证实了他对那一时期文学、艺术,尤其是建筑的先锋派都做出了重要的回应。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或许是他对卡夫卡(Kafka)、特雷蒂亚克夫(Tretjakov)、德布林(Alfred Döblin)、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接纳,以

及在别处对新客观现实运动的批判性回应。最为重要的是，克拉考尔证明了自己是魏玛时期最杰出的电影评论家之一。谈到本雅明的时候，同样不能仅仅谈他对美学运动如现代主义的兴趣，而且必须谈到他在接纳这些运动方面的积极参与。除了他早期的文学评论和对波德莱尔、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 的翻译，以及对卡夫<sup>5</sup>卡、列斯克夫 (Nikolai Leskov)、马尔罗 (Andre Malraux) 等许多人的接纳之外，他对超现实主义的接纳和对布莱希特的戏剧和政治纲要的广泛讨论，对他建构自己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然而，最重要的是，波德莱尔作品在拱廊街计划中的中心地位，证实了它是本雅明洞悉 19 世纪现代性世界的一个关键的源头。所有这些，使得克拉考尔和本雅明，在对新的媒体（如电影和广播）的兴趣和参与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区别。

因此不足为怪，在三位作者那里，对现代性社会理论的探求，与对于现代主义目标以及时而是方法的关心融合在一起。的确，他们三人中几乎没有一人可以被归纳为现代性社会理论的某一简单类型，尤其不可能被轻易收编进某一独立的专业，譬如说社会学。然而尽管如此，这里要讨论的正是他们对现代性社会理论的贡献。比较而言，将齐美尔纳入到这个讨论范围，是较少需要辩护的。如果直到最近齐美尔对现代性理论的贡献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话，那么，克拉考尔对现代性理论的贡献——连同他对社会理论的其他贡献——几乎是完全被忽视。其原因不仅在于克拉考尔对批判理论的贡献被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的贡献所掩盖，而且在于他的贡献遭到某些法兰克福成员，如鼎鼎大名的阿多诺